

# 左宗棠为何在西北劝种棉花

众所周知,近代史上的左宗棠,既有抬棺出征、捍卫边疆的威武豪迈,作为一代名臣,他也有针对地方实际、务实发展的治理才能。150多年前,他在陕甘总督任上倡导种棉花即是一例。



清代《御题棉花图》中棉花收贩的场景。

**课吏课心,倡导种棉**  
同治八年(1869)十月,左宗棠正式接陕甘总督防。同治十年(1871),结合当时实际,左宗棠在陕甘尤其是甘肃地区倡导大面积试种包括棉花在内的多种农作物。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期的甘肃,实际包括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河湟区域的西宁府,以及新疆的镇迪道(巴里坤和乌鲁木齐地区),区域广泛,地势扼要,可辐射整个中国西北部。

除了宣传动员农民种植棉花、派员到外地精选种棉推广,当时的陕甘地区官府还从生产流程考虑,官方出资购置纺车织具,“设局教习纺织”,雇请产棉区有经验的老农来教习织布技能,提升棉花经济价值,以此引导百姓多种棉花。

左宗棠非常关注西北棉花种植推广情况,要求陕甘地区官员多到乡村进行调查,一有机会,他自己也做实地考察,同百姓交谈,以便更多掌握棉花栽种的情形。同治十二年(1873)棉花收获季节,左宗棠在甘肃乡间同百姓攀谈,了解棉花推广情况。据称,这里的百姓都知道种棉花的收入与以前种植罂粟的获利差不多,而且还有可能超过,百姓都愿意种植棉花。左宗棠很是欣慰。

为系统推广棉花种植,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左宗棠刊行农书《棉书》和《种棉十要》,要求陕西、甘肃两省向适宜种棉区广为散发,切实讲解,以使当地百姓掌握种棉花的基本要领。《棉书》内容丰富,对种棉、收棉、纺线、织布整个流程的讲解,简明而细致,非常实用。

左宗棠不愧为一个高超的管理者,他指导出台了相应的考核机制,将推广种棉的进度实效作为适宜种棉地区官员政绩

的一个重要考核项目。他总结出推广种棉的贯彻要领——“专以切实两字,为课吏与课心之要”。所谓“课心”,是指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西北地区百姓从思想认识上真正懂得种植棉花的好处;所谓“课吏”,即指严格考核各级官吏推广种植棉花的情况,奖优罚劣,奖励惩懒;“课吏”与“课心”的关键点是切合实际,将种植棉花工作执行到位,落到实处。左宗棠于同治十三年,专门上奏折,建议对“官绅士庶有能实力奉行(种棉花),著有成效者,准予择优叙奖”。

通过“课吏”种棉,左宗棠也发现了一些地方能吏,如署宁州知州杨大年、署正宁县知县黄绍新、署镇迪道周崇傅、秦州知州王镇塘等,都因劝农种棉,勇于担当,推广得力,得到嘉奖。

## 为何提倡种棉花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继林则徐之后第二位真正严禁鸦片的政治家 and 疆臣。在陕甘总督任上,他不仅设法禁止外国鸦片流入,而且深刻认识到,栽种罂粟和吸食鸦片不仅是西北贫困之因,也是西北民风由强悍而颓靡、致衰致乱的根源。所以,他在辖区内严禁百姓种植罂粟。为

达到根本禁止罂粟的目的,解决陕甘地区禁种罂粟后百姓的生计问题,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借鉴棉花产地的种植经验,论证出“凡宜罂粟之地,最宜种草棉,棉花之利,与烟土相若”,西北不少地区的土质适合种棉花,在经济上种棉花也能取代种罂粟的获利,这是左宗棠决定系统在西北地区“劝种棉花”的一个主要原因。

左宗棠提倡种棉花的第二个原因,是当时西北地区干旱,百姓生存艰难,尤其甘肃“民苦无衣甚于无食,老弱妇女衣不蔽体”,这对来自南方的左宗棠而言,实在不可思议,既然缺少衣服穿,自己种棉花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所以,他决心“教种桑棉为养民务本之要”,以解决西北贫困群众的穿衣问题。

左宗棠在西北大力推广种植棉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军需。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左宗棠西征成功,得益于粮饷军备的充足供应,大力号召边疆屯垦功不可没,这其中也包括种植棉花解决西征军棉衣军装在。

当然,左宗棠是个务实之人,在种植棉花上不搞“一刀切”,对适合种棉的地区大力提倡种棉花,对不适合种棉花的地区,则不作种植棉花的硬性要求,而是指导多种其他农业经济作物以增加粮食生产,改善百姓生活。

同治十二年,肃州一带棉花丰收,“一亩之收,佳者竟二十余斤,每斤千文”,收入不菲,并且种棉花收棉花比“罂粟剥果刮浆”要省工省力得多,更重要的是,种植棉花有利无害。

在左宗棠经营西北十多年后的光绪六年(1880),陕甘地区“耕垦日广,民食渐充”,更让左宗棠感到欣慰的是,西北地区的百姓穿衣问题有了明显改观,“罂粟既禁,以其地改种草棉,向之衣不蔽体者,亦免号寒之苦”。

## 务实担当的经世情怀

史料和实践都表明,左宗棠在西北倡

导种植棉花的做法,具有综合治理、一举多得的社会功效。左宗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在西北劝导百姓种棉花是“敦崇本业,力挽颓风,于陕、甘民生习尚不无小补”的惠民实政,力求杜绝害民误国的罂粟种植,为西北地区百姓找一条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农业生态链。可以说,这也彰显出左宗棠务实担当的民生情怀。

“左公乃五百年第一伟人”——20世纪初,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如此评价左宗棠。左宗棠任陕甘总督之初,郑重其事地给左氏家庙撰写了一副对联,上联为:“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为勉励家族子弟,左宗棠还在家塾撰写了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由对联的字句之间,可一窥左宗棠的人生抱负和思想脉络。

左宗棠在青年时期深受湘籍官员贺长龄、陶澍的思想影响,中年时期得到林则徐等官员的认同,思想渊源于明末清初学问家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作为自然经济时代出生于农村的一名知识分子,尽管左宗棠也饱读诗书,青年时期身历科举,中年以后决战场、提督洋务、经略西北,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另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位至一品,尊为侯爵。但是,综其一生来看,他一直不改农业种植的嗜好,这是他的个性,也是他经世致用思想的一个质朴体现,在左宗棠看来,这也是最基本的国计民生。

总之,150多年前,左宗棠在陕甘乃至西北地区,在巩固边疆的同时,大力倡导屯垦和种棉种桑,始终把发展农业经济、尽可能地提高百姓生活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来做,利民利国,既是历史时势发展的需要,也出自个人的经世情怀,二者契合,以成大计,彪炳青史。 □李晓琦

## 人物

# 西安稠酒与陕北米酒

西安稠酒与陕北米酒,都是陕西饮品中的佼佼者,都很有内涵、很有历史,也很有名气。西安稠酒,历史悠久、名头很响。有文献记载的酿造史,肯定在唐朝以前,而在大唐尤为兴盛。当年的“贵妃醉酒”“李白斗酒诗百篇”等,可能就是饮的这种酒。这种用糯米酿制,酒精度也就15度左右,如果饮到迷醉的状态,应该是喝了不少。不过这种酒确实质地细腻、入口绵润、口感香甜,但凡饮者,忍不住就会多喝,刚喝下去感觉很温柔,但越是低度酒越是后劲大,等酒劲散发的时候,饮者往往还不自知,但已经无法自控了。不过话说回来,这种诱惑力很强、表面又很具有“欺骗性”的酒,真的喝多了问题也不太大,断不会有后世的高度蒸馏酒的劲头,所以贵妃还能唱出“海岛冰轮初转腾”,李白还能“醉草吓蛮书”。当然,这种被郭沫若先生称道“不是酒、胜似酒”的酒,也是柔中带刚的,不然贵为皇妃的杨玉环也不会失态,诗仙李白也不会狂妄到让高力士脱靴的。

西安民间饮用稠酒也很盛行,家庭朋友聚餐,善饮或不胜酒力的人对稠酒都能接受。西安稠酒到现在也是节日里馈赠的名贵特产,许多人会把它当礼物送给亲朋好友。在这样的消费态势下,西安稠酒一直在有一定规模的生产,并且随着现代生产技术的提升,加之注重传统,所以稠酒的品质一直很稳定。

西安稠酒很多时候被称作“黄桂稠酒”,那是在稠酒中加入了黄桂。“黄桂稠酒”色泽白中微黄,质地细腻绵密,米香桂香相融,味道微甜甘爽,是一款文人雅士和贩夫走卒、豪爽汉子 and 矜持淑女都能接受的饮品。

陕北米酒,应该就是“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依儿呀那个脸蛋儿”那个脸蛋儿信天游里唱到的酒。陕北出产优质小米类谷物,这其中品种很多,可以细分为多个类型。尤其是其中的“糜子”,也就是稷,黍,是“五谷”中重要的一员。糜子磨去皮后称黄米、黄小米,其中又分软糜子、硬糜子,用糜子酿酒,做糕,是陕北人赋予这一植物体的美好用途。

北宋范仲淹曾任陕西经略副使兼延州知州,这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政治家、文学家,在此期间曾有词《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峰里,暮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其中的“浊酒”当是陕北米酒。

米酒,也被当地人称作“甜酒”“稠酒”“浊酒”等。但主流叫法一直是“米酒”,也许是为了与已经约定俗成的“西安稠酒”区别,陕北米酒很少有“稠酒”的叫法。

陕北米酒,色泽是小米胶皮黄,气味是小米芳香,口味与稠酒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有别于西安稠酒的是,由于小米与大米质地及体积的不同,所以米酒的过滤不如稠酒彻底,这也使得米酒的口感不是非常顺滑,但在这不顺滑中又似乎可以咀嚼到小米的糯香,也是乐事。

相对而言,米酒在陕北的市场更广一些,但凡宴席欢聚,总能看到它的身影。一碗黄小米酒,一盘黄米糕,如果再能来个糜子做的“黄馍馍”,那就是一餐“黄小米”的盛宴,黄土高坡的亲切质朴也会扑面而来。 □草青

秦 味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

## 胜 迹

# 湘子庙的传说

湘子庙街位于西安南大街南端西侧,东起南大街,西至大车家巷南口。长521米,宽12.3米。此街为唐长安皇城太常寺处,唐末以后形成居民街巷。明代在街东段建湘子庙,街随庙名,称“大湘子庙街”,偏西南街称“小湘子庙街”。1966年此街改为东升街,1981年将大湘子庙街街合称湘子庙街,属居民区。湘子庙街因庙而得名,可见该庙名气及影响之广泛。湘子

# 小雁塔的神奇魅力



庙是一处全真道观,传说是中国道教“八仙”之一的韩湘子出家的地方,也是其生活故居,该庙建于宋代。历史上的湘子庙香火旺盛,金元时毁于战火,明重新修建。自明末到民国初湘子庙仍然香火旺盛,但难免再经战乱侵害,庙内殿堂或被占用或遭摧毁。直到2005年5月,由八八庵出资上百万元修复湘子庙。这次修建是按湘子庙的原貌进行修复,采用“修旧如旧”的原则,

经钻探查明,离小雁塔四周地面三十米就开始出现夯土,每进一米就厚一尺,整个地基呈半球球体,塔就建在这个半球球体上,地震时因塔受震的应力均匀分散,与不倒翁一样,所以屡震不倒。

二是塔身底大顶小,有高出三米的台基,并以青石垒底基数层,再以条砖砌出塔之身基,有这样一个坚固的底座,曲线柔顺,下重上轻,重心偏下的塔身,在地震时重心始终没有超出底座宽度,地震时裂缝两边可以产生向心力,使裂缝重新弥合。

三是塔身质量过硬,砌筑时砖与浆的粘合力强,塔体建筑强度大,整体性好,绝非“豆腐渣”工程。在地震的作用下,做到了从末松散,只裂不酥,只裂不倒,虽经反复离合,但一直傲然挺立,符合现代抗震要求。

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国家极为重视。1964年曾拨出专款,对小雁塔进行修缮,塔顶保持不变,从里到外都是唐代原状,用暗藏钢筋加固塔身,从而结束了反复离合的历史。

小雁塔独特的造型和结构,可谓塔中的典型代表,对全国古今古建筑都产生了不少影响。早在唐宋时期,云南、四川等地建造的密檐式塔,尽管各自都有当地特点,但仍可以看出有小雁塔的影子及其之间的嬗递关系。对于现代建筑,小雁塔更是一些建筑师模仿的对象。东北有一家假日酒店,用现代材料建造,外形酷似小雁塔,弧形的塔楼造型别致,隽秀优美,成为当地独树一帜的标志性建筑。在这里,小雁塔的基因还在延续。 □王雄文



历史沧桑的千秋石鼓  
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传世文物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最为璀璨的一组刻石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在文学史、文字史、历史学、书法史上均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重印弁言》中高度评价说:“石鼓诗不仅直接提供了一部分古代文学作品的宝贵资料,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民族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诗经》的真实性。”

石鼓在唐代贞观年间(627—649)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古名陈仓)凤翔县(秦朝时叫雍城,唐朝时叫天兴县)三畴原。原物为形状类似鼓形的10通石头,高与直径均约60厘米(其中最大的石鼓“鼃车”高60厘米,周长235厘米,重550公斤;最小的“田车”重300公斤;其余的各重400公斤左右),其形制四周围而见方,上细下粗顶端微圆,腹部微微鼓出,外呈圆状。每件石鼓上分别环刻有四言韵诗一首,每首诗十八九句不等,共10首,每字约4厘米。其时,吏部尚书苏勗记拓本石鼓的《叙记》卷首说:“史籀之迹,近在关中”“虽岁久讹缺,遗迹尚可见。”唐永徽三年(652),章怀太子李贤也著书记载了石鼓的状况。由于石形似鼓,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最早把这些刻在石鼓上的文字称为“石鼓文”,后世便沿用此说。又由于其文字内容是记述君王臣公们的征旅渔猎之事,颂扬田猎官宫的美好,且石形如柱础,唐代裴蒙《述书赋注》始称其为“猎碣”。因为其文字内容被弃于雍城之境、陈仓之野,故也称“雍邑刻石”“陈仓十碣”“岐阳石鼓”。

石鼓出土后,一开始被散置于荒野。唐至德二年(757),从陈仓山北阪(今宝鸡石鼓山)迁于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埋于城南20里今石落务村处。唐元和元年(806),韩愈的友人重新把石鼓挖出,韩愈作《石鼓歌》题咏:“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周网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铸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石鼓又开始为世人瞩目。元和十三年(818),郑余庆任凤翔节度使期间,将石鼓迁入城内夫子庙。唐末五代,战乱不断,石鼓被弃于凤翔之野,又散失民间。北宋初年,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任凤翔知府,经多方查找,在民间搜得其后九块将它们置于凤翔府学门底下。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向传师任凤翔知府时,在民间广泛搜求,终于找回丢失的一鼓(后被认为是“作原”鼓),可是鼓已经被截为两段,上半部遗失,下半部也被做成了臼窝。由于找回的那一鼓被上下分开,文字每行仅存4字,断续不成文,因此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极大困难。

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因喜好石鼓,于大观二年(1108)先由蔡京将石鼓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辟雍(西周时期天子所设大学,后主要为祭祀之所),为使石鼓文字免受损毁,曾用金粉涂饰其文予以保护,禁止再作捶拓,以示贵重,后人内府保和殿稽古阁。北宋靖康年间,宋金交战,金兵攻入汴梁后,视石鼓为奇物,便把石鼓等奇玩全部运抵燕京(今北京)王宣抚家,用刀刮除泥金进行拓印,以审度石鼓的真实面目,后将它们置于国子监大成门内。南宋端平元年(1234),元灭金,攻占金都燕京,元人不识此宝,将石鼓弃于废墟,幸有元兵中的一个头领是陕西宝鸡人,出于保护家乡珍珍的目的,将石鼓移于国子监底下。此后,石鼓历经元明清数百年风雨沧桑,一直保存在北京国子监内。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清高宗到辟雍讲学,见此物后极为重视,为更好地保护原状,令人重新选石仿刻10鼓(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仿鼓现收藏在北京国子监内。清朝灭亡后,石鼓由故宫博物院收藏。

1931年9月,日军虎视北京,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故宫博物院南迁,在院长马衡的主持下,石鼓分10辆汽车运至南京、上海,后辗转迁移安放在四川峨眉山。抗战胜利后,复迁至南京,1948年又运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逃往台湾,石鼓也被列入运走的宝物名单之中,后因时间仓促且石鼓过重而作罢。1956年,石鼓被列为国宝级文物,曾在故宫箭亭设“石鼓陈列室”展出。

石鼓文自发现后,命运多舛,荣耀之时置于大宋皇帝御榻之旁,且以金粉充填其字;零落之际弃于泥土之中,备受颠沛流离的厄运。千百年来,石鼓文历经沧桑,饱受风雨侵蚀和人间祸乱之苦。真所谓:千秋石鼓沧桑历,百代风云浪淘淘。而今漫话奇闻,笑着寰宇多自扰。 □周惠斌

# 绿度母



年代:明代  
收藏单位:延安市宜川县博物馆  
绿度母,高12.4厘米。  
佛像头戴五叶宝冠,发髻高耸,双耳垂肩,饰大耳珥,两肩有花,臂弯长目,眉间饰白毫,双目低垂,鼻梁笔直高挺,嘴角略向上翘,透露出菩萨慈悲天悯人之意。半跏趺坐,左腿横盘,右腿前伸,右足踏于莲座伸出的莲花之上,左手当胸捻开莲花之茎结三宝印,右手结与愿印,手足的关节,肌肉感刻画写实而柔软。 □宋延龙

鉴 藏